

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 人文研究的新視野

黃俊傑*

進入廿一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動向正隱然形成之中。這股新動向主要是由於「全球化」潮流與亞洲的崛起這兩大力量的相激相盪所造成。「全球化」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並身處其中的潮流，而亞洲的興起不僅是因為在亞洲歷史上出現如儒學、佛教、道家、神道等偉大的精神傳統與宗教信仰，出現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中國傳統醫學等文化遺產，出現影響深遠的律令制等政治制度，更是因為最近十餘年來亞洲地區的快速崛起，《東洋經濟週刊》曾統計：自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五年的十年之間，亞洲各國之間的航空旅客成長率是109%，遠超過全球跨洲的平均成長率 60%、亞洲與北美間的 67%、亞洲與歐洲之間的 59%，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 36%。而且，全球

各地人口超過千萬的十九個大城市中，有十一個在亞洲。亞洲的崛起應是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可以預期的新趨勢。在亞洲地區勇猛發展之際，東亞地區的人文學術研究迫切地需要新的取向與新的視野。

但是，回顧廿世紀東亞各國的人文研究趨勢，固然個別學者或研究機構有其精深紮實的學術成就，但是就其大趨勢而言，常常出現兩項明顯的傾向：

第一，二十世紀東亞人文學界許多著作常以西方經驗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架構，以東亞經驗印證西方學術理論。例如，廿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侯外廬（1903-1987）宣稱他「主張把中國古代的散沙般的資料，和歷史學的古代理法，作一個正確的統一研究。從一般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的意義上言，這是新歷史學的古代法則的中國化，從引伸發展上言，這是氏族、財產、國家諸問題的中國版延長。」¹ 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確實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恩理論的亞洲版本之註腳。

第二，廿世紀東亞各國學者人文研究的視野常以自己國家為中心，較少採取跨國或跨界之視野，因此，較少或難以提出具有普遍意義之命題。廿世紀中、日、韓各國的文、史、哲研究論著，呈現相當明顯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族論述」。

以上這兩大問題常交互作用並互為因果，所以流弊所及，使東亞學術界的潛力難以發揮，正如張光直（1931-2001）在一九九四年所說：「中國人每個人都有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本錢。研究的資料，則有一部二十四史，自五十年代便為瑪麗·瑞德教授向一般社會科學者介紹為全世界最豐富的一座研究人類歷史上各種行為的規律的寶庫。為甚麼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² 張光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應廿世紀東亞人文學術研究的問題，在廿一世紀全球化的新時代裡，我建議東亞人文研究可以採取以下三種研究取向：

第一，聚焦東亞經驗，以東亞為視野並從東亞出發思考。事實上，跨出國家疆域而以東亞作為研究之範圍，正是廿一世紀人文研究的新動向。進入廿一世紀以後，隨著亞洲（尤其是東亞）的興起，以及「全球化」趨勢的加速發展，東亞人文學界開始從廿世紀常見的「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格局，逐漸轉而以東亞為研究的視野。舉例言之，日本東京大學原有的「中國哲學」講座，就更名為「東亞思想文化

學」講座。日本各大學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資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OE）計畫，也大多以東亞為視野。南韓政府所推動的「廿一世紀韓國頭腦」卓越計畫（簡稱 BK21），在人文學科方面的計畫也是以東亞為研究範圍。臺灣自二〇〇〇年開始所推動的兩梯次卓越研究計畫，也都是以廣義的東亞文化範圍為研究領域，如「東亞儒學」、「東亞民主」、「華心理學」等計畫，加上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所屬創始計畫如「東亞法治」、「全球化」研究計畫以及「華人的觀與我觀」與「生產力與效率：從東亞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計畫，均在不同領域與程度上說明了廿一世紀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的新取向。這種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國界的、跨學科的、多語言的多重視野。這種學術社群必然是管弦嘖嘖、眾聲喧嘩的，是「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學術社群。

第二，以經典或價值理念為研究之核心。

廿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基礎，這種狀況固然與清代樸學的學術傳統有關，也與廿世紀初年歐陸實證主義思潮相激盪。在實證主義風潮之下，廿世紀中國人文研究論著，關懷「事實」遠過於「價值」，就是形成於這種時代研究氛圍之下。

但是，問題是：「事實」如果不是置於「價值」的脈絡中加以衡量，那麼，「事實」的意義多半難以彰顯。展望廿一世紀的人文研究，除了過去所注重的「事實」問題之外，更應加強有關「價值」問題的研究，尤其是承載價值理念的經典，更應成為人文研究的核心。

第三，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我們雖然主張以「從東亞出發思考」作為新時代人文研究的策略，但我們也必須注意東亞各國歷史經驗

1 侯外廬：〈自序〉，《中國古代社會史》（上海：中國學術研究所，1948年）。

2 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擠身世界主流〉，《亞洲週刊》（香港），1994年7月10日，頁64。

與人文傳統中的「同」中之「異」。只有深入具體而特殊的而且有地域特色的各別文化脈絡，我們才能開發並拓展全球的視野，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所謂「具有全球意義的地域知識」，正是指此而言。

東亞各國固然都分享漢字文化、儒家價值理念、佛教信仰、傳統中國醫學等共同的文化質素，但是，中、日、韓、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差異，也不容我們忽視。例如，作為儒家價值承載者的儒家學者，宋代以後的中國是士大夫階級，與朝鮮時代（1392-1910）朝鮮社會的「兩班」階級不同，也與德川時代（1600-1868）日本的儒者只是一般的知識份子，在各自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大不相同。

因此，如果我們能將東亞文化的共同質素，放在各國具體而特殊的文化脈絡中加以分析，就更能避免「去脈絡化」的弊病，而使研究對象的發展歷程更具有實體感，也更具有厚度。

總而言之，隨著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解疆域化」，以及「區域經濟」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十加三、大中華經濟圈等經濟體的興起，人文研究勢必形成新的取向。我們主張，廿一世紀人文研究策略，可以採取「**以東亞為研究視野**」、「**以經典或價值為研究之核心**」，並「**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以開展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